

# 香港社會文化史論集

劉義章 黃文江 合編

仁德署

# 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

劉義章、黃文江

合編

**《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Hong Kong*

劉義章 黃文江 合編

©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2002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86543-1-4

2002年第一版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5412

電子郵遞：unitedcollege@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uc

製作：中文大學出版社

# 前言

聯合書院及其前身五所成員院校（華僑、廣僑、光夏、文化和平正）植根香港，見證了本港從戰前一個轉口貿易港發展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大都會的歷史進程。一直以來，書院其中一個學術發展重點就是香港史；而這個教研領域的帶頭人乃吳倫霓霞教授。吳倫教授於1960年代初加入本校服務，講授世界史和香港史。三十多年來，她推動本校史學教研工作不遺餘力，而於香港史用功最勤、用力最深。吳倫教授培養了無數新一代香港史教研人才，亦使本校成為該學科研究重鎮。

吳倫教授從事教研工作的同時，盡心盡力贊襄校務，為書院策劃良多而意義深遠的學術和文化建設工程。其中犖犖大端者，當數由她主編的本校四十周年校刊《明德新民：聯合書院四十年，1956-1996》，以及她所領導的「校史文物館籌建小組」。今天，位於香港中文大學巍峨的馬料水山巔、在秀麗的聯合校園內，矗立著一所美倫美奐的「岑才生校史文物館」，它見證了吳倫教授對聯合數十載的款款深情和奉獻精神。也因與書院這段情緣，她雖然已從大學榮休，仍樂於擔任本校資深導師，為推動聯合學術文化和教育事業繼續發揮力量、作出不可或替的貢獻。

過去本校曾出版《聯合學報》，所刊登者俱為各學科教授擲地有聲的宏論鴻篇，當中亦載有吳倫教授的研究創獲，可謂珠玉並陳。今天，她的學生為感激其教誨之恩，特編撰《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一書呈獻給他們的業師；可以說，在她契而不捨地長期默默耕耘的學術園地上，已結出纍纍碩果。深信吳倫教授必定喜見當年她所循循善誘的學子，現在已被陶造成學有專長之士。本人與吳倫教授在聯合共事逾三十載，能目睹她於榮休之時從門生手上接過這份獻禮，內心為她感到無限歡悅。同時，本書由聯合書院出版，它或將成為本校學術專刊陸續問世的契機，從而為加強書院的學術研究起著一分催化作用。本人忝任書院院長，實有厚望焉。

黃鈞堯

於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2002年3月8日

## 劉 序

筆者早年曾有在香港受教育的機會，1938-39年在拔萃書院修業一年，考取香港大學及格。後雖轉赴昆明肄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惟深以拔萃畢業之資格為榮，為生平得意之事。五十年後，於1988年，自美返港赴錢賓四先生文史講座之約，始得識吳倫霓霞。讀其關於香港教育史之巨著，益感香港教育制度由來有自。英國制度及英人教育家之功不可埋沒，而香港華人投身從事教育工作，事業有發展，制度有創新，尤其值得注意。吳倫霓霞著作之有永久、重要價值，於茲可見。

1988年文史講座竣事後，承吳倫霓霞約同事驅車暢遊新界，並於返元朗後賜予筵宴；席間談及當地宗族組織及書院等教育設施，尤其言人所未言，見人所未見。吳倫氏治學之精深固因其深識英國制度之精髓及其與法律環境之關係；而其主持教務於中文大學，使其對華人在港的貢獻有深心的體會，筆之成書，永垂不朽。吳倫氏之友人，雖非長期在港工作，必引以為榮焉。

抑再有請者。吳倫氏之著作精深固不待言，而其教學之貢獻尤不可埋沒。吳倫氏自六十年代加入聯合書院後教學辛勤不遺餘力；桃李芬芳，滿布四海。而此編論文集之撰著，尤足徵吳倫氏教學之循循善誘在於培養研究人才，以學術發展為標的，不限於製造教書匠而已。香港史之為吳倫氏研究興趣之主要範圍，實為香港史之大幸，而為凡關心香港發展者所應慶賀者也。時至今日，香港史不但為英國制度史及大英帝國史之一部分，且又為中國史、世界史之一部分。際茲政治與文化不能脫離關係，而歷史與現實不可分割之情勢下，本論文集之出版尤其有重要意義，宜受各方注意，引起廣大之反響。

劉廣京 敬序

於檀香山

2002年3月1日

## 王序

吳倫霓霞教授對香港史的貢獻，是大家公認的。劉義章和黃文江給老師寫的評論已講得非常詳細，無須我在此重複。但她的史學開拓工作有兩方面是值得再提的。

一是她本來愛讀的是西洋史，而且想深入地研究歐洲近代史。但是因為教學的需要，加上當時香港社會發展的挑戰，叫她轉移研究方向，由此而成為香港史學的前驅，又可稱她為香港早期教育史的拓荒者。其實這跟她的歐洲史修養有密切關係。她特別了解英國十九世紀的歷史，在分析香港殖民地政府微弱的文教政策的時候，能尖銳地指出這政策的許多缺陷。同時，因為她中國社會史的學術基礎又好，能欣賞當時香港人的教育環境而強調本地孩子求學的困難。

1986年初我到香港時，看到她寫的*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這本書討論香港早期公共教育的演變，給我很多啟發。後來又看到她和同事同學們收集的新界私塾的資料跟幾篇有關華文教育與中國的關係，使我更加明白香港近廿年來教育改良運動所遇到的問題何以那麼曲折和難於解決。

之後，我發現她的老師是赫理森教授 (Brian Harrison) 和安德葛教授 (G. B. Endacott)。赫理森教授是我在馬來亞大學上大一歷史課的講師；安德葛教授則是我1952年到香港來找中國革命史料時，令我受惠不少的May Hall舍監和導師。所以我倆在教研方面還是先後同學，怪不得看她的著作總覺得有相當的親切感。

另一方面，吳倫教授自己從來沒有上過「香港史」的課，所以一開始就得專心去搜集第一手史料。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資料，她都採取一種無孔不入的態度。因此她在香港史學發展史上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史料的收藏和整理。

不但如此，她還培養了幾代的新史學家，鼓勵他們拉開香港史的範圍。這本史論集的九篇文章可以代表她教學的成功。這些論文都表示香港社會史未被忽略，著者都十分關心史料流失的問題。他們選來

研究的題目，不管是粵港文人的交流、難民營的醫療工作、基督教團體的作用，都得到應有的注意。尤其醒目的「日劇」文化意義，如跟村儒社會對照，真使我感覺新鮮和羨慕。吳倫教授指導的學生真能滿足她的願望，把香港史的視野延伸到更廣闊的境界去。我相信這一點會使她感到十分的愉快。讓我在此恭祝她，並囑咐她的學生們該不停地踏上她所開拓的大路，承先啟後的把香港史寫得精益求精。

王賡武

於新加坡東亞研究所

2002年6月15日

## 鳴謝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編者要感謝下列前輩、師友和機構：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院長黃鈞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榮休教授劉廣京院士和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院士在他們繁重的教研、著述和公務中，惠允撰寫前言、賜序，並對後學多所勉勵、期許；前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管理系吳仁德教授為封面題簽；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王宏志教授、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任蔡志祥教授擔任書稿評審人，提出了寶貴修訂建議；「香港社會史學術討論會」（於2000年7月14日假香港浸會大學召開）每一位論文主講者，他們尚包括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嚴瑞源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何佩然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教育系葉國洪教授和（香港）中聖書院校長梁炳華博士；（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亞洲研究系梁伯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何冠環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葉漢明教授對本書的籌劃一直予以支持和關心；作者們給予充分信任和合作；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陸國燊博士在書稿體例上給予專業意見；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院務主任戴朝明先生在出版過程中惠助良多；聯合書院基金會屬下劉偉民基金資助出版經費，使本書能夠早日問世。



# 導言

劉義章、黃文江

香港史作為一個研究範疇，它在近三十多年的發展十分蓬勃，成果亦豐。<sup>1</sup>現時，香港史的研究已脫離英國殖民者的視野與觀點。另一方面，多年來國際學術界在亞洲研究的反思，亦有助刺激香港史研究的進展。1997年王賡武主編的《香港史新編》<sup>2</sup>可以視之為香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書中多篇論文正好是從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中整理出對香港史的全面論述。在這個基礎之上，香港史研究者可往前踏進一步，以更深入的角度及細緻的方法把不同的個案整理出來，從而再併合出對香港史更深刻的認識。本書即是從這個切入點探討組成香港社會及文化其中的一些重要元素。

全書由三組文章構成，分別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組其中兩篇有關香港非華裔族群社會：〈由「防罪」到「防暴」：香港警隊中印籍警察角色的演變〉和〈十九世紀香港西人群體研究：愉寧堂的演變〉；另一篇分析西方文化內部衝突：〈十九世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一場宗教小風波：「薩默事件」和「凱帕爾事件」〉；第二組論文是關於香港文化的三個不同面貌：研究粵港文化交融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粵港文人的雅集與交游：讀黃詠雱及其《天蠶樓詩文集》〉、探討村儒的社會及文化角色的〈近代村儒的社會職能的演變：翁仕朝的教育和醫療事業〉，以及研究近三十多年香港的日本流行文化的〈「日劇」在香港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而第三組則是討論基督教與社會救濟事業，包括：〈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以及〈「基督教新村」的社會服務工作：五、六十年代香港衛理公會的個案研究〉。

〈由「防罪」到「防暴」：香港警隊中印籍警察角色演變〉論述香港早期警隊由佔顯著比例的印籍人士所組成這一特色。英國殖民地的警隊

一般主要由當地人士組成，而香港則是例外。作者指出原因有二：一、由於早期居港華人多屬社會草根階層，且知識水平低；二、英國政府恐怕一支主要由華人組成的警隊在緊急時期會「掉轉槍頭」，以致危害其殖民地政權。於是從香港以外地方、特別是同屬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次大陸輸入警察；而警隊中高層指揮官則一概由歐籍特別是英籍人士擔任，不容他人染指。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期間印籍警察佔警隊人數的30%至50%之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印籍警察出現不忠於英帝國的行為，而且他們素質欠佳、效率下降，香港警隊的組成乃出現變化。加上十九世紀末以來，隨著香港華人的知識水平不斷提高，本地華人佔警隊人數比例漸增，亦有出任高級職位者。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不再向香港輸出警察，香港警隊「本地化」之趨勢也就不可逆轉。此外，作者還指出印籍警察除了保護居港歐洲人士的安全和防止罪案的發生外，還有「防暴」作用。由於每當中、外衝突或爆發戰爭時，香港政府恐怕華人會站在中國那一邊；這個時候，政府每每動用印籍警察來鎮壓華人的抗爭。警隊中印籍警察的「防罪」和「防暴」二重角色從側面說明了香港社會的複雜性。

〈十九世紀香港西人群體研究：愉寧堂的演變〉指出早於1840年代，香港已出現一群嘗試融合中西文化的人士，使香港成為不同族裔、文化交流之地。往後香港社會中外華洋人士始終未能徹底融合，而各有自己的社區網絡和認同。教堂英文名稱是Union，意指不同宗派背景信徒之間，以及華洋人士之間因為有著共同的基督教信仰而合一。雖然這個西人信眾群體經歷了許多困難時刻，也嘗過不少考驗，包括會友人數一度劇減，多位牧師因受到教友排斥黯然而退，但愉寧堂都能渡過。當中有創立人理雅各以及湛約翰和歐德理的功勞，他們堪稱愉寧堂早期的柱石。由於三人俱嫻於漢學和漢語，因此成為促進香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動力。愉寧堂最終發展成從英國倫敦傳道會自立的會堂，這象徵它植根香港和走向「本地化」。除了成為本地西人基督徒的聚合點和中心外，愉寧堂亦聯同道濟會堂向香港華人傳教。這與創會牧師理雅各的理想遙相呼應。

〈十九世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一場宗教小風波：「薩默事件」和「凱帕爾事件」〉是有關一宗因未能互相尊重、包容和接納而產生的衝突。香港教師英國人薩默往澳門旅遊，遇上天主教基督聖體聖血節；他雖然擠身聖體出遊行列中，卻沒有接受勸諭脫下帽子。他最後被澳葡當局扣留獄中，等待法院裁決。後來英國駐澳門軍隊將領凱帕爾訴諸武力，以劫獄方式救出薩默。事件涉及澳門主權和英國領事裁判權等問題。香港報章報道這宗事件時，採取了不同立場，有認為薩默的行為「可以理解」，視他為因宗教而受到逼害；也有批評他不懂尊重別人、無禮和欠缺包容。對凱帕爾也有正反不同的報導和評論，支持的一方認為其行為合理；反對的一方則批評他行為狂妄，致使英國蒙羞。當時香港報章雖然都由葡萄牙人經營，可是輿論並沒有一面倒支持澳葡一方。當事實真相呈現後，包括凱帕爾在內大家都認為薩默的行為不智，香港報章（除了一份例外）都不以薩默和凱氏的行徑為然，並且認定解決糾紛的最佳方法是互相尊重和彼此包容。這反映了香港社會試圖平衡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香港除了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樞紐，亦是粵港文人雅集交游之地。誠然，香港與內地文人之間的雅聚並不限於粵籍人士，例如從1860年代在港長期生活和工作的王韜來自上海，並且與理雅各合作翻譯儒家典籍，「王、理合作」譜寫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讚歌。由於港粵地理一體、人流往還比較內地其他城市和省份方便，因而兩者關係密切。〈二十世紀上半葉粵港文人的雅集與交游〉以黃詠雱為例探討兩地文人交往的情形，反映了嶺南學術文化在香港的延伸，以及三十年代後期，由於日敵入侵，內地陷於戰亂當中，學人文士到港避難者多，他們在港舉行雅集、賦詩詠懷，從而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菁華。這種文人雅集使香港成為這個時期華南文化重鎮。文章另一重要訊息是：透過詩社雅集的方式，文人結合成一種輿論力量，或鍼貶時弊，或致力提升民間學術文化，從而更新國人傳統思維，為國民心理和精神文明現代化而默默耕耘。此外，作者更指出這種知識群體網絡建立起來的「公共領域」，有待學者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上層知識份子通過雅集賦詩言志，為保存和傳承中國學術文化而努力的同時，村儒又扮演著什麼角色呢？〈近代村儒社會職能的演變：

翁仕朝的教育和醫療事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較完整的圖象。透過對村儒翁仕朝生平的研究，文章一方面描述了20世紀上半葉香港鄉村群體的日常生活情狀，保存了其時香港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樣貌；同時揭示了一位亦儒亦醫的翁氏在鄉村教育和行醫的角色和貢獻。此外，作者通過探討翁氏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演變，剖析傳統中國社會在西潮「衝擊」和中外接觸後所作的「回應」。其中教育方面，從翁氏本人推動新式教育、延聘具有新知識的學者擔任學堂教席，可見他為了配合新時代的需要作出了調適。這是積極求變的一面。可是行醫方面，一如作者所言：「對近代西方醫學的新知和所帶來的影響，翁氏則未有作出回應。」文章亦分析了私塾式微、而中醫學能繼續傳承的因由。

港粵文化交流源遠流長，黃詠雱交遊圈子反映了這種密切關係。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包括香港在內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寢寢乎已發展成現代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重鎮。本書第一組文章探討了香港社會多元民族這一方面的特色；第二組文章則論述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國際性：正當中西古今文化在香港這塊土壤榮芽滋長之際，東洋文化亦靜悄悄地登陸香港這顆東方之珠。

香港社會除了出現上層文人和村儒為傳統文化學術的傳承和發揚而努力之外，亦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現盛極一時的日本潮流文化。〈「日劇」在香港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一文讓我們回顧「日劇」帶給幾代香港人的影響。日本潮流文化包括衣著、飲食、音樂，以及日用品如電器和汽車等，自七十年代以來滲透到香港社會各個角落，它們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這方面反映了香港作為中國對外交往和吸納國際文化的重鎮；另一方面，由於電子傳媒科技日新月異，加速了這種文化滲透之外，「日劇」在香港所引發的日本文化熱，其背後的意義值得大家深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迄六十年代，基督教宣教士、華人牧師及信徒合力在香港從事多項社會救助事業。當時香港一方面剛處於戰後滿目瘡痍的景況、百廢待興；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權易手，這時選擇離開家園和祖宗廬墓的國人在1950年前後蜂湧而至，香港社會及經濟的負擔驟然間百上加斤。在香港處於極度困難的時刻，宣教士和他

們所屬教會及時伸出援手，使這個東方明珠再度生輝。〈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探討一個跨宗派基督教救援機構為調景嶺難民提供醫療服務。這些宣教士大多數曾在中國內地從事宣教和醫療工作，例如來自挪威的司務道教士即從1938年起在陝西省服務了十多年，迄1951年離華為止。教士在調景嶺營的無私奉獻可說是他們過去在內地事工的延續，亦說明香港的社會發展與中國大歷史的關係。

〈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從另一個側面探討基督教會對難民的援助。宣道會為生活上陷於饑寒交逼和精神上極度空虛的難民予以適切扶助，在調景嶺營建立教堂向難民傳播福音，填補他們空虛的心靈；設立手藝工場使難民可以自食其力，過著一種有尊嚴的生活。此外，宣道會在營中還興辦教育，設立幼稚園、小學和聖經學校，令兒童可以上學，亦為教會培養了不少牧師和傳道人。文章指出宣道會在調景嶺營的宣教工作一度十分興旺，這與從華北、華中等地撤退到香港而通曉普通話的宣教士有關。他們與營中同是來自北方的難民沒有語言隔閡，而且同樣有著一種難民心態，因此易生共鳴。在外籍宣教士與華籍牧者和信徒特別是九龍塘宣道會婦女部成員協同努力下，宣教成果顯著，在最高峰時信徒人數達一千以上，佔全調景嶺營基督徒總數一半。梁文分析了宣道會以及整個調景嶺營宣教事工在經歷了瞬起後，到1960年代復轉趨瞬落的種種原因。

1950年代由於大量外地人口湧至，香港住屋出現嚴重問題。當時，無論市區或郊外山坡，遍佈用紙皮或木料蓋搭而成的寮屋，居住環境極差，隨時遭受風、火等災害，住在這些寮屋內的人士惶惶不可終日。〈「基督教新村」的社會服務工作〉論述了香港衛理公會興建石屋平房新村、為居民提供比較舒適和安全住所這段歷史。公會先後於1955和1959年在港島掃桿埔和九龍荃灣大窩口分別建設了衛斯理村和亞斯理村，村內設有教堂、學校、診所和社區會堂，衛斯理村更開設製品公司，讓村民利用閒暇從事生產刺繡、籐器和衣服等商品。作者一方面指出衛理公會通過建立新村舒緩住屋問題，從而建設一個有宗教特色的社區；另一方面，則以社區發展的視野評估這兩條新村在香港社會史上的意義。這一組文章通過對教會等有關檔案的爬梳和深入

觀察，論述香港非政府機構在社會服務上所扮演的角色。

今天，香港史研究已經演變成為一門顯學，本書對香港社會與文化史多個方面作了微觀考察，期盼於香港地方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能稍起添磚加瓦的作用。

〈香港史的開拓者〉記錄了一位香港史研究前輩吳倫霓霞的學術進路和歷程。文章首先交待她如何在1950年代香港經濟困境中，以及大學學位和資源極度不足下獲得入學機會。60年代是她的學術思想發展時期，初期師事富於文獻史料研究的香港大學歷史系學者。後期負笈美國深造，又獲歐洲史、社會史及社會學名家指導。1970年回港，她受命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開設香港史。作者根據採訪所得、有關大學各部門記錄和資料，以及她的著述，探索她在近三十年於香港史的資料搜集、教學心路歷程和學術研究成果。文中縷述了其對官方與民間資料並重的研究進路。她在英國各地發掘出不少當時少為人注意的資料，並與中外學者合作，在新界進行田野搜集工作，成果見於其在香港教育、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以及新界研究等各個範疇的著述。同時，她亦率先於1975年開辦全面及綜合性的香港史學科，致力於採用不同方式教授不同對象的本科生、研究生、成年兼讀生及國際交換學生。文章尚列舉了一些經她培訓而今從事香港史教育、科研和文化推廣的人才，最後並以其就香港史發展方向所提出的意見作結。文章既為香港史學史補白，而同時對有志於香港史研究的年青學者或有所啟發，能在前輩的成果基礎上創出新猷。

本書每位作者在不同階段肄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且皆曾師從吳倫霓霞教授，親炙恩師的教誨。現在，他們就各自於香港史研究的一些初步心得彙集成冊，作為弟子們的獻禮，以誌老師從大學榮休和告別杏壇。

書中如有紕漏之處，尚祈讀者、方家不吝指正。

註 釋

1. 有關香港史的研究發展，詳見：Elizabeth Sinn,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n Hong Kong: A Review,”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4 (1994 [1997]): 147-70；及李培德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
2. 全書共兩冊，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 目錄

|    |         |      |
|----|---------|------|
| 前言 | 黃鈞堯教授   | vii  |
| 劉序 | 劉廣京教授   | ix   |
| 王序 | 王賡武教授   | xi   |
| 鳴謝 |         | xiii |
| 導言 | 劉義章、黃文江 | xv   |

由「防罪」到「防暴」：

|                  |     |   |
|------------------|-----|---|
| 香港警隊中印籍警察角色的演變 ✓ | 吳志華 | 1 |
|------------------|-----|---|

十九世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一場宗教小風波：

|                |     |    |
|----------------|-----|----|
| 「薩默事件」和「凱帕爾事件」 | 陳宇山 | 19 |
|----------------|-----|----|

十九世紀香港西人群體研究：

|          |     |    |
|----------|-----|----|
| 愉寧堂的演變 ✓ | 黃文江 | 37 |
|----------|-----|----|

二十世紀上半葉粵港文人的雅集與交游：

|              |     |    |
|--------------|-----|----|
| 讀黃詠雱《天蠶樓詩文集》 | 趙雨樂 | 57 |
|--------------|-----|----|

近代村儒社會職能的演變：

|               |     |    |
|---------------|-----|----|
| 翁仕朝的教育和醫療事業 ✓ | 李光雄 | 75 |
|---------------|-----|----|

「日劇」在香港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

|       |    |
|-------|----|
| 高橋李玉香 | 97 |
|-------|----|

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

|     |     |
|-----|-----|
| 劉義章 | 113 |
|-----|-----|

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

|     |     |
|-----|-----|
| 梁家麟 | 131 |
|-----|-----|

「基督教新村」的社會服務工作：

|                   |     |     |
|-------------------|-----|-----|
| 五、六十年代香港衞理公會的個案研究 | 邢福增 | 153 |
|-------------------|-----|-----|

香港史開拓者：

|           |         |     |
|-----------|---------|-----|
| 吳倫霓霞的教研工作 | 黃文江、劉義章 | 177 |
|-----------|---------|-----|

|      |  |     |
|------|--|-----|
| 作者簡介 |  | 209 |
|------|--|-----|



# 由「防罪」到「防暴」： 香港警隊中印籍警察角色的演變

吳志華

## (一)

「A、B、C、D，大頭綠衣，拉人唔到吹BB。」這首耳熟能詳的本地童謠頗能生動地描繪出早期香港警隊的特點——警隊成員來自不同種族人士，而素質與工作表現卻未為社會大眾所滿意。

香港早期警隊由歐洲籍、印度籍及華籍人士所組成，警員衣領上配戴有A、B或C為字首的編號牌以資識別，例如歐籍警員是AXX、印籍是BXX、華籍是CXX，後來更加添以D為編號字首的俄羅斯籍警員。童謠所指的「大頭綠衣」是指頭纏圍巾的印度籍警察。香港的印籍人士俗稱「摩羅差」。「摩羅」一詞本指清真教徒，香港亦有摩羅廟街（Mosque Street）的名稱，此詞後來泛指所有纏有頭巾的印度或中東人士。至於「差」乃指差役，是早期警察的稱謂。<sup>1</sup>在1862年的中文版《政府憲報》（時稱《政府轅門報》）中，警察司（Superintendent of Police）（相當於現時的警務處長一職）就被譯作總差役官。「摩羅差」原本單指印度籍警察，後來所有在港的印籍人士，也被冠上此帶有種族色彩的稱謂。

香港首批印籍警察出現於1844年9月，成員由英軍借調，主要用於夜間巡邏街道，保護歐籍商人的安全。翌年，殖民地警隊正式成立，印籍警察成為歐、印、華三大骨幹隊伍之一。在往後的一百年，香港政府一直維持一支強大的印籍警察隊伍，佔警隊總人數比例的30%至50%之間；其地位、薪俸和服務條件都在華籍警察之上。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在眾多英國殖民地警隊中可謂絕無僅有。

印籍警察與香港警隊發展的關係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課題。透過分析前者在後者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香港警察制